

貫徹基本國策，包括下列四個堅決不變的原則。

第一、中華民國的國家體系根據憲法第一條將永遠不會改變，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

第二、中華民國反共復國的基本目標永遠不會改變。

第三、中華民國堅守民主陣容，維護國際正義和保衛世界和平的基本立場永遠不會改變。

第四、中華民國與中共叛亂集團不妥協的堅定立場將永遠不會改變。

在對外關係中，中華民國政府始終不渝的堅守以上四個堅決不變的原則。世界不是靜態的，而在不斷的改變之中，亦有基本不變的因素。形成中華民國之外交政策的因素主要有：(1)歷史的潮流；(2)對人性的認知；(3)文化的睿智綜合；(4)地理位置；(5)三民主義——建國的指導原則。

(一)對歷史潮流的體認

公元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是現代西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與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以及光榮革命同樣的具有深遠的影響。法國革命摧毀了政治、思想、外交、戰爭方面的古老秩序。它也代表著民主專制主義向自由主義低頭。在當時自由主義 (liberalism) 雖然和民主政治 (democracy) 不是同義字，但有恒等的傾向。法國革命有意傳播自由主義的種籽，却在無意中激盪了民族主義，二者形成一對孿生的運動，③ 滙成了歷史的巨流。

在拿破崙戰爭後，平衡外交大師梅特涅以正統原則和專制主義來反對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這位歐洲的駕馭者 (coachman of Europe) 以他卓越的外交手腕在歐洲協調 (European Concert) 中維持了奧地利帝國的壽命，也奠定了歐洲的和平達一個世紀之久。梅特涅扮演了一塊大岩石的角色，他寫道：「三十九年來，我扮演著擊退浪濤的大岩石的角色。」可是，僅是一塊岩石擋不住歷史的潮流。借用軍事術語來說，梅特涅所從事的是一個「後衛行動」(a rearguard action)，④ 這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後衛行動」。

英國的工業革命改變了西方的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在此之前，政府只要關切公共秩序和民族的安全即可，從此以後，則必

註③ 因為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淵源相同，都是根據民族自決的理論，所以季辛吉稱之為孿生運動。See Henry A.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3 p. 248.

註④ 梅特涅以正統主義來抵抗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注定會失敗的，其目的在防止和拖延這兩個力量不可避免的勝利。

須從社會和經濟生活的最低層做起。現代人類所探索的完全是新穎的民族國家 (nation-state)；也就是說，現代政府必須邁向兩個目標——政治發展和經濟發展。工業革命也產生了社會上勞資糾紛的病態。馬克思和恩格斯於一八四八年一月發表「共產主義宣言」，其中充滿了憎恨和偏見，強調不可逃避的階級鬭爭、無產階級不可避免的勝利。事實證明；共產黨徒的歷史命定論是一種幻想，足夠諷刺的是，波蘭的工人正在反對波共政權，而中國大陸實驗共產主義已經徹底失敗。共產主義在歷史的洪流中僅是一小股逆流而已。

中共偽憲法之所以要將「無產階級專政」修改為「人民民主專政」，余英時教授在「傳統文化與現實政治」一文中有非常中肯的解釋，他說：⑤

「……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現在由於波蘭『團結』工聯的出現而正式幻滅。事實上，在列寧生前已有人指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在實踐中必然要流為專制主義或『警察國家』：今天則已真相大白。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已直接處於尖銳對立的狀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神話也無法維持下去了。」

(二)對人類天性的認知

中國的政治哲學以倫理道德為基礎，而儒家的政治主張是「行仁政」，而「仁」的精神便是以倫理道德為中心。「仁」，孔子說得最多，也是他的弟子們所時常問及的。孔子在答覆樊遲時，以愛人為仁。其後在答覆弟子時，一共舉出了恭、敬、忠、寬、信、敏、惠七事，都是「仁」的內涵。根據陳百年先生的註釋：「恭」是態度和悅；「敬」就是尊重；「寬」不外是寬大的意思；「信」是言行相符或言行一致；「敏」，依據中庸的鄭註，是勉勉的意思；孔子在解釋「惠」字時說：「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故孔子所說的「惠」字應釋為「利人」。^⑥

孔子的基本主張是「仁義合一」。仁是對人，義是處事。所謂「義」，就是「宜」的意思，^⑦孔子雖主張仁以待人，可是「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所以孔子亦崇尚法治。這是義的表現，因為少正卯乃大惡之人，不誅則不合於義。今天西方政治家對「國家體系」(state system)的解釋與儒家的政治哲學是一致的。根據美國已故國務卿杜勒斯的分析，國家體系有六項特徵，第一要有反映此一社會道德判斷的法律，第二要有政治機構在必要時修訂法律，第三要有行政機構來執行法律；第四要有司

註⑤ 余英時，「傳統文化與現實政治」(中)，聯合報，民國七十二年五月三十日。

註⑥ 陳大齊，孔子學說，臺北，三民書局，民國六十五年，頁七九—二三六。

註⑦ 中庸哀公問政章云：「義者宜也。」

法機構根據法律來解決糾紛，第五要有至高無上的力量來對公然違犯者強制執行法律以阻止暴力，第六要有足夠的福祉，人民始不會挺而走險。^⑧

義大利中世紀政治家馬基維里 (Niccolo de Bernardo Machiavelli) (1469-1527) 主張權謀術數，爲了達到國家目標，可以不擇手段，令人警惕。可是他在名著君王論 (*On Prince*) 一書中所提出的政治格言，至今西方政治家猶奉爲圭臬。馬氏對人性有深切的瞭解，他忠告當時的君主們說：「明君應放棄沒收他人的財產，因爲人們較容易忘記他們祖先的名字，而不易忘記他們世襲的財產。」^⑨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亦說：「政府反映人性。」中共政權沒收人民財產，實行人民公社等暴政，更以「勞改」和「下放」企圖消滅人民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當人民因沒有足夠的福祉而挺而走險時，中共却大肆濫殺。這些都是罔顧人性、慘無人道的行爲，我們的基本國策和外交政策之所以堅決反共是基於對人性的認知。先總統 蔣中正曾說：

「人之性即天性，亦即自然之理，如違反自然之理，就是反乎人道，拂乎人性，其人必敗，其國必亡。」^⑩

(三) 太平洋時代的來臨

人類日擊科學和技術的勝利，而科技的發展將人類帶到一個新的境界。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互相依賴的時代」(an era of interdependence)；而科技的發展已縮小了空間的距離。今天的太平洋已經是一個遙相呼應的湖泊。昔日西方以歐洲爲政治生活的中心，由於人類的政治生活逐漸擴大，到十九世紀時，美國國務卿海約翰 (John Hay) 就曾以先知的預見指出：「地中海是過去的海洋，大西洋是現在的海洋，而太平洋是將來的海洋。」^⑪ 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 (Brookings Institution) 的學者在一九七九年發表的一篇報告中說：「太平洋盆地是世界上最有潛力的區域。」^⑫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季辛吉在香港演講時稱：「地球的重心已由大西洋轉移到太平洋，而此一區域將受到美國政府逐漸增加的增加的注意。」接著季氏又指出：「所有東南亞

註⑧ Fred W. Riggs, "The Nation-State and Other Actors," in James N. Rosenau,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9, p. 90.

註⑨ See Theodore A. Coulombis and James H. Wolf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wer and Justice*, Secon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c. 1982, p. 138.

註⑩ 先總統 蔣公嘉言總輯(一)、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頁二五。

註⑪ Martin L. Lasater, *The Security of Taiwan: Unraveling the Dilemma*, Significant Issues Series,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Georgetown University, 1982, p. 13.

註⑫ *Ibid.*

國家畏懼蘇聯所支持的越南擴張主義的目標，雖然也有某些國家擔憂中國（共）長程的影響。」¹³季氏的談話暗示著：蘇聯和中共都不是本區域內穩定的力量。

隨著太平洋時代的來臨而接踵而來的兩個大問題，第一是蘇聯已在太平洋地區不斷的擴張勢力，第二是中共在本區域內可能扮演的角色。蘇聯爲了其資源豐富的西伯利亞的安全，已在遠東部署龐大的軍力，主要有三個目標：一是嚇阻美國攻擊其領土，二是萬一發生戰爭，對美國和亞洲盟邦發動核子攻擊，三是針對美國和盟邦在西太平洋的海空軍基地發動傳統攻擊。¹⁴國際之間所以產生危機。主要是由於一個國家決定抗拒另一個國家所作的改變，而引起連鎖的反應，當蘇聯支持共黨游擊隊企圖赤化希臘和土耳其時，引起了杜魯門主義；蘇聯控制東歐國家而有馬歇爾計畫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產生，轉而引起華沙公約組織。

¹⁵在多極體系中，主要強權的錯誤估計是危險的根源。而權力不對稱（power asymmetry）常常是爆發戰爭的主因，所以多極的體系亦是多事之秋。¹⁶假使我們接受這種觀點，則美國和中共的關係愈密切，可能導致莫斯科方面更爲強烈的反應。卡特總統於一九七八年底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對蘇聯是一個重大的刺激。一九七九年蘇聯侵犯阿富汗，雖然是應用所謂布里茲涅夫主義（Brezhnev Doctrine）來保衛一個受到反革命威脅的「社會主義」政權，¹⁷實際上，這是對美國和中共建交的一個強烈反應，希望藉干涉阿富汗的行動來糾正不利於莫斯科的權力平衡。

其次一個問題：中共是否爲西方的所謂「戰略資產」？在未來的歲月中，中共究竟將扮演何種角色？主張聯中共以制衡蘇聯的人士認爲，中共牽制了蘇聯五十個師此一事實構成了西方重要的戰略效益（strategic dividend）。如果中共獲得西方進步的科技，其改善後的軍事能力將變成西方的「資產」，而能抵消蘇聯所享有的戰略利益（strategic advantage）。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教授格瑞高博士（Dr. A. James Gregor）指出：上述的觀念是一種嚴重的錯誤。因爲北平和莫斯科的敵意無論減少到何種程度，蘇聯永遠不會減少其在亞洲的兵力到五十年代初期的程度，蘇聯在過去二十年中不斷的在開發西伯利亞的自然資源。西伯利亞是莫斯科最有價值但也是最易受到攻擊的區域，此一區域在布爾什維克革命時期曾受到國際反共干涉主

¹³ *Korea Herald*, October 30, 1983.

¹⁴ Paul Dibb, "The Soviet Union as a Pacific Pow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XXXVIII, no. 2, Spring, 1984, 237.

¹⁵ Kenneth N. Waltz,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tructural Causes and Military Effects," Douglas J. Murray and Paul R. Vioti, (eds.) *The Defense Policies of Nation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3-14.

¹⁶ *Ibid.*, p. 14.

¹⁷ *Ibid.*, p. 84.

義者 (anti-Communist Interventionist) 的威脅。^⑧高華德參議員於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二日在離美訪華前的聲明中亦說：「由於蘇聯也擔心美國在亞洲的武力，並顧慮日本：我確信，不管我們對中共的政策怎樣，蘇聯都會長久維持其在遠東地區的大規模武力。」^⑨因此將蘇聯恐懼西方的「夢魘」昇高為中共的「神話」是極其危險的幻覺。

至於中共在可能預見的將來扮演何種角色也是西方所關切的問題。遠在一九七一年當西方開始和中共接近時，英國的情報文摘 (*Intelligence Digest*) 就曾提出警告，文摘引用紅旗第四期「紀念巴黎公社一百週年」所發表的「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萬歲」一文稱：「巴黎公社帶起的革命火炬在全世界熊熊燃燒，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末日已經為期不遠。」該文進一步引用毛澤東的話說：「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後勝利，不但需要本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羣衆的努力，而且有待於世界革命的勝利。」情報文摘以「西方所忽視的一個坦白警告」(A Frank Warning Ignored in the West) 為題指出此一文件不啻是北平「新的宣言」(Fresh Manifesto)，認為這是中共發表的重要文件。^⑩

十二年後，也就是一九八二年，中共在「十二大」中除強調「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之外，再度明白的宣示：「堅持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全世界應該聽到北平的聲音：「中國(共)的對外政策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為基礎。」「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相信共產主義會在全世界實現」。今天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幽靈依然出沒在中國大陸。既然強調「世界革命」，顯示中共在國際和平統戰的陰謀中，其基本政策依然未變。一個共黨政權決不會在國際社會中樂於作一個「滿足的國家」(satiated state)。^⑪如果採取季辛吉的分類，中共政權是一個「革命性的政權」(revolutionary power)。^⑫因為意識形態的懸殊，中共在世界事務中不可能與西方達成「一致的意見」(general consensus)。如果在西太平洋出現一個「現代化」的中共政權，將是本區域乃至全世界無窮禍患的根源。中華民國堅決反共的目標之一，便是在防阻這種禍患的發生。

註⑧ A. James Greg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a Western Security Asset," *China and The West* (in Air University Review, other facts of publication unknown)

註⑨ 青年戰士報，民國七十三年四月十四日。

註⑩ "China: A Frank Warning Ignored in the West," *Intelligence Digest*, 33rd year, No. 390 (May 1971), p. 12.

註⑪ 一八五〇年八月六日，梅特涅在流亡英國返回奧國途中在萊茵河口的約翰紐茲堡 (Johnsburg) 會晤俾斯麥，梅氏向這位未來德意志的帝國總理提出忠告，希望德意志做一個「滿足的國家」，事實證明，俾斯麥接受了忠告，可是年輕的威廉二世邁向世界政策，致使人類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災禍。See Kissinger, *op. cit.*, pp. 325-326.

註⑫ 季辛吉將國際體系分為「合法的體系」(legitimate system) 和「革命的體系」(revolutionary system) 兩種，如果在國際社會中出現一個革命性的強權，則這個體系將成為「革命性的體系」，對世界事務恐難獲得「一致的意見」。see *Ibid.*

四三民主義——中西文化的睿智綜合

在文化接觸 (acculturation) 的過程中，任何民族必須作睿智的綜合。英國哲學家羅素 (Bertrand A. W. Russell) 在「中西文明對照」一文中的結論是：東西文化的接觸，如果選擇二者的優點，將產生新穎的文化，而青出於藍，勝於藍。反之如果選擇其他文化的缺點而又揚棄了自己文化的優點，這是非常危險的選擇。²⁴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 (Arnold J. Toynbee) 在渠所著：「我為什麼不喜歡西方文化」一文中指出：馬克思主義和希特勒標榜的社會主義都是西方文明中的垃圾。²⁵「中共曾經」批孔揚秦，顯然是崇尚暴力，放棄了中國民族文化中的精髓，而吸收了西方所揚棄的垃圾——共產主義，這是最壞和最危險的選擇。余英時在「傳統文化與現實政治」一文中談到文化選擇時說：「我們所能作的只是自覺地、分析地、批判地加以選擇和改造，無論是全盤西化或馬克思主義化都行不通。」²⁶

中山先生思想的基礎——三民主義是古今中外學說精華的綜合，而主要的是中國固有的正統思想，他曾說：

「中國有一個道統，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絕，我的思想，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一個正統道德來發揚光大的。」²⁷

所以 中山先生的思想是繼承堯舜以至於孔孟而中絕的仁義合一的思想。余英時在「論中國文化」時說：「本來中國文化是比較理性的一種文化。至於以大傳統言，它重王道、重均衡，像儒家基本上比較理性。」²⁸

就民族主義而言，中山先生主張以美國為「榜樣」，將國內各宗族合一爐而冶之，重建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進一步主張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邁向世界大同。鄙棄帝國主義就是「均衡」的表示。民主主義主張全民參與的民主政治，調和各階層的利益，又將「權和能」劃分清楚，而五權比三權分立更有穩定的制衡作用。民生主義主張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以及私人企業和國營企業的均衡發展，以建立均富和諧的社會，是最適當的折衷調和。

今天臺灣海峽兩岸，實際上是一個思想的鬭爭，而戰勝邪惡思想的最佳武器就是代表正義的思想。三民主義是中國傳統文化

²⁴ See Bertrand A. W. Russell,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Contrasted."

²⁵ See Arnold Joseph Toynbee, "Why I Dislike Western Civilization."

²⁶ 參閱余英時，前揭文（中）。

²⁷ 國父在接見荷蘭人馬林時所說。

²⁸ 余英時，前揭文（上）。

的結晶，是「王道的」；而共產主義是外來的垃圾，既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又違反人類基本的天性。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在一九八三年元旦祝詞中明白昭示：

「我們的外交政策，是始終站在自由民主的一邊。今後無論世局如何演變，我們這個基本的外交政策，永遠不會改變。我們不會讓外在的衝擊，來影響我們國家的政策；而且，我們更要以反共產、爭自由的精神去影響今天的世界大局，並為自由世界在文化、經濟等方面，作出我們最大的貢獻，這是我們外交的基本方針。」²⁸

二、為合法地位和聯合國的理想而奮鬥

一九四九年，中共竊據中國大陸之後，在復興基地的中華民國於詭譎多變的國際政治中，始終不懈的奮鬥著，我們對外拓展外交關係主要的是維護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合法地位，以維持國家的存在，但積極的意義是在為聯合國的崇高理想而奮鬥，在國際社會克盡我國應有的責任。

(一)維護中華民國國際地位

當一九四九年我國處於軍事逆境、赤禍蔓延之際，杜魯門主義不但未能適用於中國，而且美國政府於是年七月底發表對華關係白皮書，認為中國大陸之陷落，「係在美國政府控制範圍之外」，排脫了雅爾達密約以及馬歇爾調停等種種錯誤。而我國政府之「忍辱負重」亦超越了極限。²⁹十月，中共偽政權在北平登場，在國際間發生了承認偽政權及在聯合國會籍的問題，在其後的歲月中，我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在維護中華民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地位。

偽政權甫告成立，毛澤東即於十二月十六日遣赴莫斯科，經長期談判，而於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四日公佈所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兄弟黨」和「兄弟國家」旋即進入穩定的蜜月時期。雙方因有正式的「條約」關係、意識形態的親和力，以及與美國的敵意，北平和莫斯科同屬於共產集團，中共變成了蘇聯的附庸和工具。國際社會形成壁壘分明的東西兩大集團；也就是緊密的兩極體系（Tight Bipolar System）。意識形態有效的鞏固了自由和共黨兩大陣營。³⁰

註²⁸ 中央日報，民國七十二元旦。

註²⁹ 參閱陳志奇，美國對華政策三十年，臺北：中華日報社，民國六十九年九月三十日，頁三二—二八。

註³⁰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July 1981) Vol. 33, No. 4, p. 491.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杜魯門總統下令第七艦隊協防臺灣。六月二十七日，在發表的宣言中稱：「共產黨軍隊佔領臺灣，勢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區域的安全。」^{②①}此一宣言肯定了臺灣的戰略地位，中共公然向聯合國挑戰，派軍隊赴韓參戰。美國在聯合國的旗幟下毅然負起國際警察的任務。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蘇聯席捲東歐，英國雖然贏得了勝利而失去了帝國，而且英國的力量退出了蘇伊士運河以東地區。當年英國的夢魘(British nightmare)是「將英國排斥在外的歐陸和平。」^{②②}韓戰說明了國際共黨的陰謀，美國必須避免朝鮮半島這個重要的緩衝國落入國際共黨手中，進而威脅日本的安全。

在韓戰中，我國政府提供大韓民國物質和精神的援助，其後聯合國第五屆大會通過譴責中共為侵略者的決議案，以及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來臺是我國外交上的勝利，緊接在後的是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聯合國中通過我國所提的控蘇案，自此之後，客觀情勢逐漸對我國形成有利的發展。

大戰雖已結束，而同盟國家尚未與日本締結和約。韓戰爆發之後，美國始積極重視對日和約的談判，其時英國等已承認中共偽政權，杜魯門政府的國務院顧問杜勒斯以對日和約專使表示：如有我國簽約，對中國大陸不發生效力，所以多數國家表示反對，盟國對日和會於一九五一年九月四日在美國舊金山揭幕，我國抗戰八年，犧牲最重而未能參加實因客觀的國際環境極為險惡之故，我國乃積極進行與日本議訂雙邊和約，是年十二月十日，杜勒斯訪問日本，終於促成了中日雙邊和約的談判。一九五二年中日雙方代表於四月二十八日，亦即舊金山和約生效之日，在臺北正式簽訂了「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根據此一條約，日本同意「在舊金山和約中所給予其他盟國的優惠，同樣給予我國，是以我國與其他盟國處於平等的地位，業已獲得承認。」^{②③}舊金山和約中准許日本自由決定其認為可能代表中國的政府簽訂和約。所以舊金山和約簽訂後，日本態度猶疑，未有與我國簽訂和約之意。此時，美國具有勸告日本實踐諾言的手段：那就是在中日未簽訂和約之前，美國暫不批准舊金山和約。^{②④}

韓戰促使美國從事亞太地區安全體系的安排，乃先後和菲律賓、澳大利亞、紐西蘭、韓國和日本等國簽訂安全條約，一九五四年九月，更有東南亞公約的締結，但亞太地區的安全體系仍缺少重要的一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尼克森副總統訪華時，有締結中美安全條約之議，幾經磋商，終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由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華府正式簽訂了中美

註②① 引自國家建設叢刊，第三冊，外交與僑務，臺北：正中書局，民國六十年，頁一三七。

註②② Kissinger, *op. cit.*, p. 31.

註②③ 同註②①，頁一五〇～一五一。

註②④ 陳志奇，前揭書，頁八一。

共同防禦條約。根據該約第六條之規定：「所有『領土』等辭，就中華民國而言，應指臺灣與澎湖……並將適用於經共同協議所決定之其他領土。」此一條約使中美復為盟邦，對臺灣局勢的穩定和我國國際地位有所幫助。更重要的是：西太平洋的安全體系更臻完整。此一條約雖屬防禦性質，但我國反共復國的國策，絕沒有改變。⁵⁵

(二)為聯合國的理想而奮鬥

追求持久的和平以及建立穩定的世界秩序一直是人類最偉大的努力。當代人類面臨共產主義幽靈和核子戰爭幽靈的威脅，其希望的最佳基礎在探索過去學者和政治家所提出的各種不同的世界合作的途徑，以避免戰爭。自法國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拿破崙於一八〇四年出現在世界政治舞臺起，世界進入了現代時期。在現代時期，人類已經歷了三次大規模的全面戰爭——拿破崙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拿破崙帝國崩潰之後，梅特涅利用正統主義來抵抗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革命的浪潮，梅氏深信專制王朝必須通力合作，不然即會逐一的毀滅。因此經由歐洲協調，由當時五強——奧、普、俄、英、法定期舉行會議以解決歐洲的問題和糾紛。這種會議體系(Congress system)證明是維持和平的有效方法。歷史學家格蘭特(A. J. Grant)和鄧波雷(Harold Temperley)將「歐洲協調」視為人類「國際政府第一次嚴肅的實驗」。⁵⁶歐洲協調終歸失敗，因為正統主義和巴力門主義(parliamentarism)二者之間是無法和解的意識形態。可是歐洲協調維持歐洲全面和平有一世紀之久，其作為一個體系雖然已經瓦解，但是以協調的努力在主要國家之間達成一致的意見以解決糾紛和維持和平的觀念始終存在著。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威爾遜總統向國會發表宣戰咨文時，「歐洲協調」的觀念復甦，換上了新裝，威爾遜總統提出了「一個自由民族的協調」(a concert of free peoples)的觀念，希望「為所有國家帶來和平與安全並使世界終於獲得自由」。⁵⁷國際聯盟有先天的缺陷，再加後天失調以致終歸失敗。威爾遜總統雖然提倡此一組織，可是因為美國沒有批准凡爾賽和約，也就沒有參加此一國際組織，國際聯盟始終未能發揮其作為「一種永久和普遍的會議體系」的功能，其主要障礙是缺乏「國際協調」(international concert)，像一個回生乏術的長期病人，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即告死亡。格蘭特和鄧波雷二氏將國際聯盟稱之為「第二次建立國際組織的偉大嘗試」(the second great attempt to create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

註⁵⁵ 同註⁵⁴，頁一五四～五八。

註⁵⁶ A. J. Grant and Harold Temperley, *Europ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6th ed., London-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2, p. 139.

註⁵⁷ Harold C. Syrett (ed.), *American Historical Document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INC., c. 1960, p. 342.

ation)。」^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政治家已準備在為戰後建立一個持久和平的體系，羅斯福總統不相信一個傳統的權力平衡體系或者是勢力範圍的安排真的會消弭主要強權之間的競爭。他認為任何這種安排均不穩定，整個世界將立即分裂為兩個武裝的陣營——一個是西方民主的陣營，而另一個是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有鑑於此，羅斯福總統有意按照一八一五年歐洲協調的體系來重建世界的秩序，因而有「偉大設計」(Great Design)的提出，希望由擊潰軸心國家的盟國維持團結和合作。由美國、英國、蘇聯和中華民國四強來建立戰後的安全體系，經由四強合作來應付對和平的威脅。羅斯福稱四強為「四位警察」來維持戰後的和平，這就是戰後聯合國初期的構想。^③

我國自始即以四強之一的地位，積極的參加聯合國的制憲會議和籌備工作，其最崇高的目標在於促進國際的瞭解和合作，維護國際正義及和平，進一步實現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邁向世界大同的理想。所以聯合國成立時，我國贈送禮運大同篇大理石碑，這是我國對聯合國崇高理想支持的象徵。

我國不僅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又是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及託管理事會理事國。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九日，前外交部長沈昌煥在國防研究院發表「我國外交政策」演說中指出：中山先生遺囑中「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話，到今天，仍然是我國外交政策和外交行動的最高指導原則，先總統蔣公是一位睿智而有遠見的政治家，深信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是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一個先決條件，所以在開羅會議時就向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提出大戰結束後，各弱小民族應自殖民地主義中獲得獨立自由的建議，聯合國憲章中第一條和第五十五條中鼓勵民族自決及准許新獨立國家參加聯合國的條文，就是根據中華民國的建議而產生的。^④

一九五〇年一月，蘇聯向安理會第四五九次會議中正式提出所謂「中國代表權問題」，其後在聯合國及其所屬機構中，都有共產國家或親共國家不斷提出類似提案。我國積極奮鬥，經過無數波折至一九七一年仍能屹立不搖，排斥我國代表權案未能得逞。

作為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我國在此一時期內努力的為此一國際組織的崇高理想而奮鬥，扮演一個積極而建設性的角色，所

註② Grant & Temperley, *op. cit.*, pp. 143-144.

註③ Gordon A. Craig, and Alexander L.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Diplomatic Problems of Our Tim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08-9.

註④ Leland M. Goodrich and E. Hambro,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Boston: World Peace Foundation, c. 1949, p. 95.

遺憾者，國際局勢在不斷的轉變中，我國代表權案逐年提出的方式並不盡同，因應策略亦隨著改變，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自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以「緩議案」的方式解決，第二階段自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以「重要問題案」提出而須經大會三分之二多數贊成，始能通過；第三階段自一九六六至一九七〇年，國際之間有所謂「兩個中國」的謬論，而使我國代表權問題更為複雜，在一九七〇年聯大第二十五屆常會中，發生二十五國棄權，五十一票贊成，四十九票反對，而有兩票逆差之出現。

④ 一九七一年聯合國大會有關中華民國代表權問題的表決結果是五十五票對五十九票，以四票之差，未能達到三分之二的多數，我國代表團旋即宣佈退出聯合國，中共進入此一世界性的國際組織。是年八月，中華民國作為創始會員國贈送聯合國的中國傳統精神的禮運大同篇的大理石碑悄悄的被移去，紐約時報於八月十日在社論中特別指出此一行動的荒謬，社論說：

「聯合國當局甚至已經屈從共黨試圖重寫歷史的計畫。在此間的聯合國總部中，中華民國所贈送的匾額已經移出：像這種小伎倆決不能抹殺中華民國對聯合國四分之一世紀所作的實質貢獻。」⑤

學者因個人的見解、期待、哲學取向等不同，因而對聯合國有不同的評價。凡對人類有能力生活在良好秩序下寄於很大期望的人士認為聯合國已是一個失敗、是外交的酒吧、一個沒有牙齒的小怪物，吼聲大而不能咬人。從一九六一到一九七一年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字譚曾說：

「當我們一天復一天的，凝視著太陽從我們土生的地球上的煙霧和污染的海浪中下沉時，我們必須嚴肅的詢問我們自己：我們是否真的希望其他星球上未來的宇宙歷史學家在談論我們時說：『儘管他們有那麼多的天才，以及他們有那麼多的技術，而他們却已耗盡了遠見、空氣、食物、水和觀念：』或者『他們繼續在玩弄政治直到他們的世界在他們周圍崩潰為止』，或者『當他們仰視之際，為時已經太晚。』如果聯合國沒有做任何事情，它至少能夠在發出警告時達成了一個緊要的目的。」⑥

學者視聯合國為國際組織第三次偉大的實驗，聯合國的基本弱點是憲章第二條第一款各會員國「主權平等」的原則。尤其是

註④ 國家建設叢刊，第三冊，外交與僑務，頁一八六—八八。

註⑤ Thomas U. Bellows, "Taiwan's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70s: A Case Study of Adapation and Viability," *Asian Survey*, Vol. XVI, No. 7 (July 1976), p. 593.

註⑥ Theodore A. Coulombis and James H. Wolfe,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wer and Justice*, secon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 c. 1982. p. 289.

第七款稱：「本憲章不得認為授權聯合國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且並不要求會員國將該項事件依本憲法提請解決……」因此聯合國的有效性端賴會員國的自願合作，以及大國的協調一致。⁴⁴換言之，它取決於所有會員國是否具有「共同體的感覺」(Sense of community)，正如斯華連(Oscar Svarlien)所說：

「聯合國在面臨極端危險的國際局勢中的相當無能，並不是由於此一組織的法律結構和規則程序的缺失，而是由於充分發展的世界共同體的意識尙付之闕如。」⁴⁵

三、戰後中美關係的演變和檢討

美國在孤立主義時代輕視他們所謂歐洲污濁的權力政治。美國避免捲入權力平衡不僅是由於距離的恩賜，英國海軍的保護，而且是一種道德，是美國以道義為重的象徵。自從一九四五年，美國積極的參與世界事務，不得不面臨權力政治的現實，然而美國仍能將權力和道德相提並論，權力平衡自此之後變成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在過去三個世紀中，英國對歐洲扮演平衡者的角色，今天的美國取代了英國，對整個世界扮演平衡者的角色。過去，英國不能容忍歐洲被一個強權所控制，因為英國的資源不能與整個歐陸的資源匹敵，美國全球性的地位亦然如此，不允許敵對者直接或間接的控制著世界，維持權力平衡變成了美國生存所必需。羅賓生(Thomas W. Robinson)在論「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一文中強調維持權力平衡是英、美兩國歷史性的完全認同的利益(identical interest)⁴⁶。國家也和人一樣也會犯錯，不過其後果更為嚴重，回顧戰後中美關係，而予以檢討有助於今後兩國關係的發展。

(一)三十年的離合滄桑

一九五〇年春天，毛澤東和史達林締結了同盟，兩個共黨政權崛起歐亞大陸，蘇聯席捲了東歐，而中共介入韓戰，威脅著東南亞的安全。一九五五年五月，季辛吉在「外交的限制」一文中指出：「縱令是沒有一個革命性的意識形態，一個中蘇共集團

⁴⁴ David Thomson, *Europe Since Napoleon*, 2nd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5, p. 831.

⁴⁵ Oscar Svarli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of N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1955, p. 325.

⁴⁶ Thomas W. Robinson, "National Interests," in James N.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c. 1969, p. 184.

從厄爾巴河 (Elba) 延伸到中印邊境，由於其本身的力量將代表著對其所有隣國一項持續的危險。」當時季氏即有意將兩極的世界轉變為多極的體系來維持世界的和平，他說：「古典的權力平衡其組成分子具有多元性，因此同盟的變遷能夠補償力量的波動。」^④這可能是有意將北平從共黨集團中分開來的早期企圖。

一九四七年的杜魯門主義挽救了希臘和土耳其免於受共產主義控制的命運，此一主義促使美國承諾防禦全世界民主國家，反對「直接或間接的侵略」。^⑤可是杜魯門主義並沒有適用於中國，對於正受國際共黨直接和間接侵略的中國而言，僅是一張「空頭支票」而已，中國大陸淪陷後一直到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之前為中美關係的低潮時期。美國在此一時期的對華政策是所謂「靜待塵埃落地」，甚至盼望毛澤東變成亞洲的狄托，隨著韓戰的爆發，中美關係始有改善。^⑥韓戰終於使美國憬然而悟，中共已變成蘇維埃的附庸和中共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國。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魯斯克 (Dean Rusk) 在演說中指出：

「我們承認中國的國民政府，即使在其控制下的領土已大為減少，我們相信它更真實地代表著偉大中國人民的觀點，特別是他們歷史性的要求免於控制的獨立。」^⑦

一九五三年，艾森豪將軍出任美國總統，中美關係在幾經周折之後，進入穩定而正常的時期，新總統於二月二日在第一次國情咨文中，不僅解除了臺灣的中立決定，而且命令「不得使用第七艦隊保護中共」。^⑧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我國並與美國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此約確定了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確保了臺、澎的安全。對美國而言，這是美國在亞太區域性集體安全的一個重要環節。值得吾人注意的是：在理論上及正式條文中，美國並沒有限制我國反攻大陸，但是在事實上，艾森豪政府並不支持我國反攻，其實際的效果是加強了「兩國中國」的局勢。^⑨尤其是，以堅決反共為名的杜勒斯國務卿於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如果中共方面有所反應，美國政策將有重大改變的可能性。」^⑩其時臺灣海峽危機正在發展之中，雖然

註④ Henry Kissinger, "The Limitations of Diplomacy," *New Republic*, May 9, 1955, p. 7.

註⑤ Hars J. Morgenthau, "The American Tradition in Foreign Policy," in Roy C. Macridis, (ed.), *Foreign Policy in World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Inc., p. 1962, p. 204.

註⑥ 關中，美國外交與對華政策，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六十六年六月，頁一〇四。

註⑦ 引自關中，前揭書，頁四。

註⑧ 引自陳志奇，前揭書，頁六九。

註⑨ 引自關中，前揭書，頁七一。

註⑩ 引自關中，前揭書，頁一一。

美國支持中華民國，但杜氏談話暗示著美國和中共有改變關係的可能性。

甘迺迪總統時代，美國對中共的政策即有顯著的改變，甘氏曾說：美國重大利益在於「維持和保衛一個變化多端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之中，沒有一個強權或幾個強權的集團能威脅美國的安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甘氏在遇刺逝世前一週在記者會上表示：假使紅色中國表示願意與美國及其隣國和平相處，美國將重新估計政策，我們不願與紅色中國為敵。^⑤甘氏的言論不僅表示美國企圖將中共與蘇聯集團分開，而且有與中共改善關係的願望，是年十二月十二日，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希斯曼（Roger Hilsman）發表對中共「門戶開放政策」的演說，強調「決心將門戶打開，迎接可能的改變」。這是美國首次發表「兩國中國」的正式聲明，也是美國企圖與中共「和解」的先聲。^⑥

一九六四年，詹森政府重申對我國之條約承諾時，不再明白支持中華民國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之主張」。^⑦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六日，國務卿魯斯克在衆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中聲明：假使中共放棄「武力是解決爭執的最好方法」，並且放棄世界革命暴力戰略，則美國將歡迎與之建立良好關係。^⑧

探討中美關係，尼克森總統時代實為一個重大轉捩點，因為北平和莫斯科的分裂，國際體系亦有重大的改變。尼克森——季辛吉希望以五極體系的權力結構，並企圖以「和解」來擺脫越戰。一九六九年七月，尼克森在關島宣佈與新亞洲政策，充滿了「亞洲自決」和「亞洲和平」等觀念，也就是所謂的尼克森主義，主要有三點：

第一、美國將信守所有的條約承諾。

第二、當一個核子強權威脅美國盟邦的自由，或美國考慮某一國家之生存對美國乃至整個區域安全至為重要時，美國將作該國的后盾。

第三、當上述的威脅為核子以外的方式時，美國將在接到要求後的適當時機提供軍經援助。但美國希望直接遭受威脅的國家能提供防禦所需的人力。^⑨

註⑤ Claude Buss.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Richard Nix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4, p. 86.

註⑥ 關中，前揭書，頁113。

註⑦ Hungdah Chiu (ed.),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Taiwan: Documents and Analysis* New York: Praeger, 1973, p. 163.

註⑧ 引自關中，前揭書，14~15。

註⑨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69-1970: A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State*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1, pp. 36-37.

尼克森爲了擺脫在越戰中「警察」的角色；而追求美國的行動自由，一方面試圖與中共改善關係，一方面推行「兩個中國政策」。但尼克森政府始終對我國保證「一切條約義務和承諾」，其後因水門事件的發生，而未能與中共達成關係正常化。而且，尼克森——季辛吉所試圖建立的是五極體系，尼氏於一九七一年接受時代雜誌記者訪問時說：

「我們須謹記在世界史中，曾享有廣泛和平的唯一時刻是權力平衡時期……我們認爲我們如果能有一個強大健全的美國、歐洲、蘇俄、中共、日本，每一方平衡其他各方，而非對抗他方，形成均勻的平衡，如此可以獲致一個較爲安全和較佳的境界。」^⑤

尼克森均勻的平衡觀是受季辛吉的影響，而季氏的外交是十九世紀梅特涅外交的翻版，季氏試圖將拿破崙戰爭後，由奧、普、俄、英、法五強所形成的歐洲協調，搬到當代的層次，由美、蘇、西歐、日本和中共形成新的國際協調來代替兩極化的世界。在五極體系之中，任何兩國或兩個集團在衝突之前，必須考慮第三者的可能反應。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尼克森在結束訪問中國大陸之前與周恩來簽署了所謂「上海公報」，此一公報並非條約，其意義「含糊不清」變成了公報的特色。

北平堅持：「解放臺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就美國而言，僅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爲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國政府對此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美國在「上海公報」中並沒有接受「關係正常化」的三個無理條件——「斷交、廢約、撤軍」。事實上，「公報」對中華民國與美國外交關係及共同防禦條約皆隻字未提。^⑥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季辛吉在記者招待會中當詢及對中華民國條約承認時稱：「這一條約將予維持，這一立場至今未變。」^⑦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福特繼任爲總統，新政府的外交政策爲「沒有尼克森的尼克森主義」，繼續尊重對中華民國的條約承諾。

卡特政府所宣示的基本目標乍看之下非常崇高，要求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秩序」，而此一「新秩序是基於美國對道德價值的承認」，而不是「對共產主義的過度恐懼」(inordinate fear of Communism)。^⑧布里辛斯基認爲尼克森——季辛吉所期待

註⑤ Cited from Donald E. Nuechterlein, *United States National Interests in a Changing World*,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3, p. 49.

註⑥ 張京育，「華盛頓與北平的關係：三個層次的分析」，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初版，頁二一四。

註⑦ 引自張京育，前揭書，頁二一四，註⑥。

註⑧ See Daan Prinsloo,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Pretoria: Foreign Affairs Association, c. 1978, pp. 16-8.

的「均勻的平衡」既不存在，而在可能預見的將來亦不可能存在。布氏從意識形態的觀點來分析和比較「歐洲協調」和當代世界，而認為今天世界的權力分配極不對稱，當代的國際體系依然是兩極體系，而並不是季辛吉所稱的五極體系。布氏提出了一個權力體系的概念，如下圖所示：

$$2 + \frac{1}{2} + Z + Y$$

布氏指出上圖中的「2」代表美蘇兩個超級強權，而中共僅是二分之一的「強權」，其中「Z」和「Y」指日本和西歐兩個經濟實體。他又強調：「我們正在處理的是外交活動，而不是權力平衡。」^{⑥5}布里辛斯基於一九七三年出版兩個時代之間（*Between Two Ages*）一書，強調華盛頓的目標並不是在建立世界政府；而是在建立一個已開發國家的社會。此一社會在第一階段應該重振大西洋國家和日本；在其後的階段吸收「較為進步的共產國家」。^{⑥6}這些就是布氏聯中共以制蘇聯的「理論基礎」。因此卡特政府接受了中共所謂的「根本沒有討價還價餘地」的三原則——斷交、廢約和撤軍，而與北平達成了關係正常化。^{⑥7}美國以國內法——「臺灣關係法」取代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來處理西太平洋區域的安全問題。^{⑥8}而且臺灣關係法也是在中美兩國「沒有官方的政府代表與外交關係的情形下，繼續維持商務、文化和其他關係。」^{⑥9}

一九八一年一月，雷根就任第四十任總統，由於這位有原則的新總統在競選期間曾經表示與中華民國昇高為正式關係的願望，而受到我國朝野的歡迎，但是一方面由於美國有若干重視中共「戰略價值」的人士，一方面由於中共處心積慮的向新政府實施壓力。一九八二年五月初旬，傳出了「雷根三函」的消息。雖然美國保證不改變對華政策。可是「雷根三函」帶來了我們的嚴重關切，因為其主要內容是：

- (1) 對中共提出的「九點和平統一建議」表示「歡迎」。
- (2) 重申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註⑥5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Balance of Power Delusion," *Foreign Policy*, No. 7 (Summer 1972) pp. 54-59.

註⑥6 See Daan Prinsloo,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Pretoria: Foreign Affairs Association, c. 1978, pp. 16-18.

註⑥7 卡特回憶錄，聯合報譯，民國七十一年十月十四日。

註⑥8 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主旨是加強中美兩國「為維護和平與安全而建立集體防禦之現有努力，以待西太平洋區域更廣泛之區域安全制度之發展。」

註⑥9 請參閱卡特總統在簽署「臺灣關係法案」後所發表的聲明。聯合報，民國六十八年四月十二日。

(3) 討論解決對「臺灣軍售的辦法」。

因為中共所謂的「九點和平統一建議」其最後目的在侵佔我復興基地，其次，中華民國政府也一再重申一個中國，可是在美國，「中國」(China)一詞是指中共而言，最後，中共企圖阻止美國出售武器，而達到逼使美國承認其對臺灣的主權。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美國和中共簽署所謂「八一七公報」，雖然美國政府在發表此「聯合公報」之前，曾向我國政府提出了六項保證，但是「八一七公報」傷害了中華民國的法律地位，關於軍售問題也引起國內外的關切和揣測。

(二) 檢討、學習、接受教訓

回顧這一段中美關係的歷史過程使吾人瞭解中國大陸的淪為共黨統治是一個殘酷的現實。在這個現實沒有徹底改變之前，「外交」對我們目前而言是一種「可能的藝術」。我們的外交決策者勢難達成不能完成的目標，例如與美國恢復正式的外交關係。換言之，在目前的國際環境中，我們只能犧牲「形式」而追求「實質」。今天殘酷的現實是過去累積錯誤的結果。人類會犯錯，但也有學習的能力，培根(Francis Bacon)曾說：「當時間產生了災禍之際，也產生了補救辦法。檢討中美關係的歷史過程，謹提出以下八點，作為中美今後雙方行動的參考。」

第一、杜魯門主義是普遍性的，其目的是支持世界上所有受共黨威脅的國家，杜魯門主義挽救了希臘和土耳其，可是很遺憾的並沒有適用於中國，而僅是一張「空頭支票」而已，美國希望以「聯合政府」的方式來解決問題，為什麼會忽視幾乎大部份的東歐國家都是經由「聯合政府」的階級而變成了共黨政權的事實？

第二、美國政府始終持著中共會變成狄托的構想，中共在韓戰和越戰之後，與俄共發生分裂，其分裂原因之一是北平企圖問鼎國際共黨運動的領導權，南斯拉夫並不威脅西歐國家，可是即使中共變成了百分之百的狄托，與蘇聯互相競爭，對亞洲非共國家將構成根本的威脅，尤其是在中共軍備現代化之後。

第三、美國若干學者，尤其是哈佛學派(Harvard School)的學者認為中共代表著亞洲民族主義(Asian Nationalism)，這是極為嚴重的幻想。民族主義是中共用以篡奪政權的假面具，在這個假面具之後是企圖赤化世界的共黨國際主義。俄國人曾經利用泛斯拉夫主義(Pan-Slavism)來擴張權力，為什麼中共不能利用所謂「亞洲民族主義」來擴張權力？真正的亞洲民族主義是中華民國國父 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

第四、中共黨徒的觀點決不能代表中國人民的觀點，真正而自由的中國人的觀點是儒家所說：「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

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偉大胸襟，決不是中共所實踐的清算鬭爭和仇恨。中華民國曾經為聯合國的崇高理想，也就是羅斯福總統的「偉大設計」而奮鬥，今天，聯合國的精神何在？

第五、從地緣政治觀點來看，臺灣是西太平洋的戰略重鎮，美國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蘇聯問題專家指出：俄國人第六次在亞洲建立遠東區指揮部，其地理中心恰好是臺灣，以及俄國歷史上第一次成為海權、陸權和空權國家，此一事實說明了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從國際體系來看，現在已經是多極的體系，可是從意識形態來看，今天依然是兩極體系的時代，臺灣是阻止共產主義洪流的水壩，拆除這座水壩，赤流將在西太平洋氾濫成災。那些忽視臺灣戰略地位的人士必須作嚴肅地考慮。

第六、一個穩定的世界秩序的基礎並不是單憑權力平衡，必須同時建立一個道德和法律的秩序。美國對中共作重大讓步，而片面的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不禁令人想起道德和法律何在？任何事情在道義上是錯誤的，政治上也必定是錯誤的。作為一個亞洲國家，我們認為美國在此一地區「重建美國的可靠性、可信性和責任感的聲譽」極為重要。

第七、有的學者認為：國際法如鐘擺的擺動，在二次大戰期間，學者對國際法有過高的估計，隨後又予過低的估計，^⑨如果我們接受國際法的鐘擺觀念，則國際法永無向前邁進的希望，我們寧可認為國際法受到障礙而有退步的現象。美國片面廢約是國際法律秩序中倒退的現象，讓我們假設，美國以「臺灣關係法」來管理中美兩國之間的各種關係是國際法的一種「創新」（innovation），但美國基於國家尊嚴的考慮，似乎不能再犧牲作為「國內法」的臺灣關係法。「雖然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修正已經嚴重的損害了中華民國的安全。如果臺灣關係法的文字和精神忠實地執行，中華民國的安全和西太平洋的穩定仍能維持。」^⑩

第八、「統一」是中華民族最高願望，但是我們絕對拒絕在共產主義下的「統一」。因為共產主義不屬於中國文化，而是西方文化中的垃圾，梅特涅說：「政策基於歷史，而不是小說；基於知識而不是善意。」^⑪歷史告訴我們：與中共合作不僅不可能，而且是危險的，我們在八年對日本抗戰中，與中共「合作」的結果，我們堅苦抗戰贏得了勝利，可是失去了中國大陸。我們的知識告訴我們：中共的所謂和平統一的九點方案決不是保證，而是攫取我復興基地的陰謀，任何國家決不會以「生存」利益來作為談判的條件。

註⑨ 王學理譯，變動中之國際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年十二月初版。上冊，頁九六。

註⑩ King-Yuh Chang, "Partnership in Transition: A Review of Recent Taipei-Washington Relations," *Asian Survey*, June 1981 Vol. XXI, No. 6, p. 609.

註⑪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p. 10.

四、形式和實質並重：邁向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目標

在事實上，中華民國的外交目標一直是形式與實質並重，張京育在所著「變遷中的國際情勢與我國對外關係」一文中說：我們是以「外交關係來促進實質關係；以實質關係來推動制度化關係。前者是我對有邦交國家追求的目標；後者乃指累積了相當實質關係之後，使這種實質關係正式化、制度化。」^⑫

中華民國政府自播遷來臺之後，以持續的努力維持和開拓正式的外交關係。世界上絕大多數的自由國家多與我國有密切的文化、經濟和貿易等關係，而且與亞非拉丁美洲的新興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之後，以較為世故和彈性的策略出現在世界政治舞臺。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新華社」重新刊印了毛澤東遠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對「中共第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所發表的所謂「處置敵人三種方式」的演說。毛澤東在這篇演說中稱：「我們應該堅持原則，我們也應該有必須的彈性來貫徹我們的原則。」一般相信，這是北平將在「外交」上採取較為彈性政策的預兆。^⑬因此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有加拿大等十三個國家承認中共偽政權；一九七一年，中共進入聯合國之後，承認的國家逐漸增加。爲了粉碎中共妄圖孤立中華民國的陰謀，以及揭穿北平企圖赤化世界的野心，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於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在立法院嚴肅的宣佈我們四個堅持不變的原則：

第一、中華民國憲法所制定的國體決不改變。

第二、中華民國反共復國的總目標決不改變。

第三、中華民國永遠站在民主陣營的一邊，爲伸張正義公理，維護世界和平的職志決不改變。

第四、中華民國對於共匪叛亂集團絕不妥協的堅定立場決不改變。^⑭

自此之後，開拓總體外交，提高國際地位變成了外交工作的中心要求，一方面增進與友邦的睦誼，一方面爭取新國家與我國建交，加強與無邦交國家的實質關係，並且積極的參加國際組織、國際民間組織和國際體育活動等等。目前，在世界上第一百七十二個國家之中，與我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有二十三個。^⑮就國際民間組織而言，一九七二年九月時，我國已在六百三十五個組織

註⑫ 張京育，「變遷中的國際情勢與我國對外關係」，中央日報，民國七十二年一月十二日。

註⑬ Yin Ching-Yao, "Peking's Foreign Policy," *Issues & Studies*, Vol. VI, No. 6 (March 1970), p. 27.

註⑭ 中央日報，民國六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註⑮ 外交部禮賓司編世界各國簡介及政府首長名冊，民國七十六年。

中具有會籍，「對於開拓國民外交，增加國際友誼與合作，以及提升我國國際地位，均有極大裨益。」^⑥

實質外交是指與世界上所有自由國家，無論有無邦交，從事擴展貿易、科技合作、文化交流和發展人際關係而言：國際貿易和投資不但對中華民國的經濟發展非常重要，而且與我國有邦交國家維持連繫和與無邦交國家促進相互行動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目前我國主要貿易地區依次是美加、日本、西歐、東南亞、南非和拉丁美洲。國際投資提供所需的經濟輸入、科技和市場。目前，在我國投資的最重要國家是美國和日本，其他國家不勝列舉，此外華僑的投資也是中華民國創造經濟奇蹟的原因之一。國際投資意味著政治承諾和信心，對中華民國的前途有很大的貢獻。

科技合作在實質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與先進國家科技合作可以引進新的科技知識和提升我國的工業結構、與開發中國家合作，我國雖非聯合國一員，而仍為聯合國的崇高原則而努力，我們將從落後的農業經濟轉型為現代化工業社會的寶貴經驗貢獻給開發中國家，證明邁向繁榮的途徑決不是經由共產主義。今天臺灣海峽兩邊經濟發展的懸殊差距正可告訴世人：共產主義已徹底失敗。

渴望和平與追求世界秩序過去是、現在依然是人類最大的努力。往古今來，宗教家、哲學家和政治家已經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辯論和世界整合的途徑。可是這些探索和實驗均告失敗。因為人類共同體的觀念和世界文化 (World Culture) 尙付之闕如。世界文化的融合和傳播有助於世界秩序的建立，職是之故，中華民國不斷的在推動文化交流和發展人際關係，我們深信世界文化必須是各種民族文化中優點的綜合，而不是共產主義毒素的瀰漫。因為共產主義是人類生活的變異 (aberration)。多數學者認為：民族 (nation) 是人類的終極社會 (terminal community)，這也是國際戰爭所以發生的原因之一。^⑦ 歷史學家柯琦 (G. P. Gooch) 指出：現代世界已經由科學和文化統一起來，「民族」必須以橋樑的地位自居，是個人與人類大家庭之間的「中途客棧」(half-way house)，然後邁向「天下一家」——人類共同體的境界。

布里辛斯基博士將中共視為「較為進步的共產國家」，可以成為「新世界秩序」中的平衡因素，這是非常危險的構想。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郝爾布魯克 (Richard Holbrooke) 於一九八〇年六月四日以「美國與中國 (指中共) 的未來關係」為題發表演說時，曾提出三個極為嚴肅的問題：

第一、中國人是否能適應一個由主權平等的民族國家所組成的世界，抑或又回到過去的觀念，認為所有其他國家都應該臣服

註⑥ 參閱，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立法院第七十二會期第一次會議「行政院長施政報告」，中央日報，民國七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註⑦ 民族主義是極為複雜的力量，是整合的力量，也是分解的力量。有學者將民族主義視為戰爭的原因 (N)。See Steven J. Rosen and Walter S. Jones, *The Logic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Winthrop Publishers, INC.) p. 307.

於他們的中央與至高的權威之下？

第二、中國（指中共）是否證明能夠吸收對其現代化至為重要的觀念和技術，而不致恢復過去的仇外態度？

第三、一個富裕而強大的中國（共）是否會將其龐大的能力致力於內部的發展，或將證明為一個擴張主義者？^⑳

對於這三個問題提出正確的答案極為重要。中共雖然採用實用主義，但依然是共產政權，依然強調四個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㉑我們瞭解，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決不僅止於民族主義。哈佛學派所謂的「亞洲民族主義」極可能轉變為赤色帝國主義。中共作為共產政權決不會在國際社會中扮演一個建設性的角色。

中華民國的基本目標是以三民主義來統一中國，早在一九五八年，先總統 蔣公在中美聯合公報中已有明確的表示：「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恢復大陸人民的自由乃其神聖使命，並相信此一使命之基礎，建立在中國人民之人心，而達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為實行 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㉒

中華民族目前不幸而分裂著：她的分裂並不是由於宗教、語言或種族問題，而是為了意識形態的懸殊，中共企圖以西方所揚棄的馬列主義來取代中國人所珍視的傳統價值和「沉思的道德」（contemplative virtues）。^㉓而我們所服膺的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這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民族建設（nation-building）和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的最高指導原則，三民主義之所以正確，是因為基於人性，是時代的潮流，而其實踐已經在臺灣創造了一個經濟奇蹟和政治穩定。故總統蔣經國先生也一再指出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才能解決「中國問題」，他說：

「中國必須統一，中國必須富強，中國人必須能過免於恐怖和不虞匱乏的日子，是每個中國人的共同願望。如今問題擺在前面，中國人過著兩種不同制度的生活方式，要中國人本著良知來作選擇究竟統一在共產主義還是統一在三民主義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下，才能使中國富強，才能使中國人幸福？這是所有中國人，要對歷史負責的選擇，這也就是所謂「中國問題。」^㉔浩瀚的太平洋已變成一個湖泊，我們深信一個非共產的中國，一個以三民主義為基礎的中華民國是太平洋和整個世界和平的唯一選擇。以道義來支持當代中國人以三民主義來統一中國的運動一定會獲得世人普遍的支持。

註⑲ 郝爾布魯克演說全文，中國時報，民國六十九年六月六日。

註⑳ 根據一九八二年，五屆人大修改的偽憲法，將「無產階級專政」改成「人民民主專政」，省掉了兩個「堅持」的動詞，參閱中央委員會大陸工作會出版，對中共政權偽憲法的評析，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頁二。

註㉑ 引自丘宏達，「維護中華民國國際地位幾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中美關係問題論集，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頁一四六。

註㉒ 英國哲人羅素（Bertrand A. W. Russell）在「中西文明對照」（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Contrasted）一文中指出：中國文化的精髓是中國人的「沉思的道德」。

註㉓ 中央文工會編輯，國家、國策、國運，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六十九年三月，頁二〇八。